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21世纪中国语言文学系列教材

中国 当代文艺思潮

(第三版)



ZHONGGUO DANGDAI WENYI SICHAO

主 编 陆贵山
副主编 卢铁澎 包晓光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21世纪中国语言文学系列教材

中国 当代文艺思潮

(第三版)



ZHONGGUO DANGDAI WENYI SICHAO

主 编 陆贵山
副主编 卢铁澎 包晓光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当代文艺思潮 / 陆贵山主编. — 3 版. —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 5
21 世纪中国语言文学系列教材
ISBN 978-7-300-19270-3

I. ①中… II. ①陆… III. ①文艺思潮-中国-当代-高等学校-教材
IV. ①I209.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93420 号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21 世纪中国语言文学系列教材
中国当代文艺思潮
(第三版)

主 编 陆贵山
副主编 卢铁澎 包晓光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80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版 次	2002 年 6 月第 1 版
印 刷	北京昌联印刷有限公司		2014 年 5 月第 3 版
规 格	185 mm×260 mm 16 开本	印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张	24.25 插页 1	定 价	45.00 元
字 数	594 000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第三版序言

在当代中国文论的现实语境中，充满了西方文艺理论和文艺思潮的话语。可以说，西方文艺理论、文艺思潮的本土化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是同步进行的。西方现当代的文艺理论和文艺思潮呈现出强势状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必须积极面对西方现当代文艺理论和文艺思潮的挑战。只有把握西方现当代文艺理论和文艺思潮的基本特征，承接和吸纳西方现当代文艺理论、文艺思潮和文化思想资源，融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建设之中，才能重构新质态的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毫无疑问，中国当代文艺思潮具有自身土生土长的东西，但又受到西方现当代文艺理论和文艺思潮广泛深刻的影响。就一定的意义、程度和范围来说，中国当代文艺思潮，是西方现当代文艺理论和文艺思潮向中国本土的移植、撒播和有所变形的重构。因此，为了深入理解作为西方现当代文艺理论和文艺思潮本土化的中国当代文艺思潮，把握西方现当代文艺理论和文艺思潮的精神实质是非常重要的。西方现当代文艺理论和文艺思潮，既有魅力，又有局限。而这种魅力与局限又往往是互为一体，杂然并存的。从西方现当代文艺理论和文艺思潮的总体精神中，可以概括出如下一些基本特性。

高度的内向化和自我化。以海德格尔和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者的人生哲学表达了处于异化状态下的人生体验。这种描述是高度内向化和自我化的。他们有所处历史条件下的人生境遇和人生感受，如“世界是荒诞的，人生是痛苦的”，“他人即地狱”，人们感到孤独、烦恼、操劳、畏惧、迷惘、困惑、恶心、沉沦，乃至悲观失望，这些人生体验是十分真挚痛切的。这些心理症候实际上都是两次世界大战所酿成的心理创伤。一些存在主义者好比精神病态的心理医生，他们对这些精神病态心理的体验和描述，颇能为处于生存逆境中命运多舛的人们所感同身受。一些存在主义者觉察到世界的非人化的陌生和冷漠，提出使自身成为“此在”或“亲在”的祈盼。他们以高度内向化的自我意志和主观欲望作为“先于本质”的“自我存在”，一切从自我出发，提出一套“个人自由”、“自我选择”、“自我设计”、“自我塑造”、“自我实现”的“拯救自我”的方案，这些完全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不可能实现的主观幻想。但他们为了追求个体自由，欲想摆脱心理痛苦的愿望，对启发文艺真切地表现人的生态和心态，重视文艺的主体性和自由性，处理好文艺中的个体性和群体性的关系都是颇有助益的。同时要看到，这种封闭性十足、排他性极强的个人主义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冷漠现实，贬抑群体，脱离大众，对以集体主义思想为基础的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的确立以及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可能产生一定的负面作用。

极度的语言崇拜。文学是语言的艺术。首先，西方现当代文论对文学语言的研究取得了深层次、全方位的进展。批判继承西方现当代文论的这些语言理论的成果是理所当然的事。19世纪中叶后，语言哲学崛起，在一定程度上和范围内取代了传统的形而上学和自然哲学，成为一种有主导性和影响力的学术思想。西方现当代文论家多半是具有很深的学术造诣的书斋学者和擅长语言研究的行家里手。他们中间有一些人是具有变革意识的左翼人文知识分子，想通过文本语言和语言文本的研究介入社会现实，以引发社会



变革，但多半都停留在语言层面。有的语言学家极端地夸大了语言的作用，把语言的功能推向巅峰状态，将其视为拥有上帝那样的权威，认为不是人说语言，而是语言说人，不是人塑造语言，而是语言塑造人。这种表述显然是把语言和现实生活中的人的关系搞颠倒了。从第一性的意义上说，是人塑造语言；只有在第二性的意义上才能确认和肯定语言的反作用，即在一定的社会和文学语境中，人也要接受语言的陶冶和塑造。还有的学者主张语言的人文主义阐释学革命，欲想通过发动语言结构变革推动和实现社会结构变革。语言朝人文主义的转向被称为语言阐释学的“哥白尼革命”。这种意图是左翼进步知识分子的语言幻想。自“语言学转向”以来，结构主义语言学把人隐匿和遮蔽在孤立自足的封闭的语言结构中。一些解构主义者和西方马克思议文论家，主张打破僵硬的语言结构，倡导“冲破语言的牢笼”是有道理的。诚然，还有的语言学家意识到语言功能的局限性。如从逻辑实证主义者转为日常语言学派的代表人物维特根斯坦，并不承认语言是外部客观世界的反映，但又曾经追求语言与对象的同构性，后来又强调语言按照人的约定俗成的规则运作的游戏性，从而夸大了语言的相对性和随意性。可能是由于维特根斯坦的懦弱的性格和带有悲剧色彩的人生态度，他觉察到因主体和对象双方都存在着极其复杂的差异性和流变性，语言不可能非常清晰、准确地说明和解释事物，往往陷入无能为力和捉襟见肘的困境。面对语言功能的软弱无力，对那些特别陌生的神秘的事物，他主张只能“保持沉默”。尽管如此，西方的一些语言学家把语言从客观对象的对应物转换为对象的主体性构成符号，使之变成表现人的生存方式和主观意向的工具，这为语言学研究提供了新的向度、新的内容和新的视域。承接和吸纳这些新的语言观念，对充实和丰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文学语言学，从而提升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话语权力是完全必要的。

其次，西方现当代文论的语言学理论和语言的叙述学理论艰深晦涩、诡秘玄奥，往往陷入常人无法意会的语言游戏。语言学家们应当考虑运用通俗易懂的表达方式，以便为广大读者所接受。只有通过西方语言理论的大众化和通俗化，才能真正实现西方语言理论的中国化和本土化，才能真正化到大众的心里，融入普通作家和评论家的实践中。语言革命或许在组织社会意识形态、影响社会心理、发出精神呼吁、调动世俗舆论方面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持有“文本之外一无所有”这种绝对的语言文本主义观念，想通过解构和重塑语言文本来解构和重塑历史，从根本上改变社会结构和政治体制是不可能的。这种愿望大体上相当于“词句革命论”的奢望，并不意味着为现实生活和社会环境带来什么实质性的改变。

沉迷于审美学幻想。黑格尔说，审美带有令人解放的性质。西方现当代的文论家和美学家都想把审美和人的解放问题联系起来。这是非常重要的思路。倡导审美，对人的解放和社会的进步是颇有助益的。审美是令人感到可亲、温暖和慰藉的精神灵丹，对人的心灵世界具有安抚、滋润、补偿、调解、激荡、救赎的作用。有贴近现实的审美理论，也有耽于幻想的审美理论。总的感觉是，西方现当代的文论和美学与现实生活大有隔膜，多半痴迷和沉溺于审美幻想。如果说席勒的《审美教育书简》还表现出通过审美教育改造和培育人生的美和美的人生的现实感，那么从弗洛伊德的“白日梦”，到各式各样的“审美乌托邦”，到“审美救赎”，再到海德格尔的“诗意地栖居”，都带有浓郁的虚托和幻想的色彩。“白日梦”中的人生故事可能非常美丽迷人，但醒来后，穷苦的人们仍然要在痛苦和灾难中煎熬；“乌托邦”是美的，但这种美毕竟是“乌托邦”的；从根本上说，“审美”对人是无法实现“救赎”功能的；没有巨额的金钱和财富，想实现物质上和精神上的“诗意地栖居”是不可能的。海德格尔所追求的本来是荷尔德林所倡导的“诗意地

栖居”，也存在着虚假和伪善的一面。海德格尔为了当法西斯帝国哲学王，竟然在法西斯的营垒中“栖居”了一段相当漫长的岁月，令人惊异和痛惜。显然，“审美理想”、“诗意地栖居”不过是人们憧憬未来生活的美好愿景。

我们应当把具有现实根据、能够通过实践实现的审美理想和没有现实根据、不能通过实践实现的审美幻想加以区分，使审美理想多一点实际，少一点空洞的幻想。让现实理想些，让理想现实些，不要过于痴迷和崇拜审美幻想。实现中国梦，要脚踏实地，不尚空谈。从根本上说，纯审美理论是无助于人的解放和社会进步的。

具有明显的非理性主义倾向。非理性主义是现当代西方文论的主要特征和思想灵魂。非理性主义社会文化思潮贯穿于人文、主体、心理、生理、审美、内部规律、表现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之中。非理性主义无疑是具有两面性的。非理性主义研究，在人文、主体、心理、意识和语言形式符号领域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取得了相当显赫的学术成果。这些学术成果作为人类的思想文化资源，必须得到尊重、承接和吸取，以丰富和补充传统的学术格局中所空疏和缺失的部分。非理性元素是人类的生理机能和意识思想结构中不可忽视和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是对失去了历史先进性和合理性的、过时的、僵化的旧理性的反叛、消解和颠覆，对超稳定的社会结构和社会体制、思想结构和思想体制的冲击和破坏，对旧权威的亵渎和颠覆，对大一统的文化专制主义的抗争和搅扰。从这些意义上说，非理性元素具有思想解放的意义。一方面要肯定非理性研究的学术价值，另一方面又要反对一切去科学化、非科学化、反科学化的研究理路。应当科学地评价包括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和各种非理性主义的是非功过。对一切无节制地反对主流、反对中心、反对权威、反对稳定、反对统一性和整体性，主张平面化、边缘化、碎片化、无深度、去价值的观念，理应采取有鉴别、有选择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科学理性态度。一切反对认知理性、道德理性和科技理性的论说只能使一个民族陷入被动和愚昧的状态。非理性意识，作为人类思想结构中的必要的组成部分是不可或缺的。事实上，世界上不存在没有非理性渗透的纯理性，也不存在脱净理性元素的单纯孤立的非理性。我们在批判非理性主义社会文化思潮时，不要把非理性主义的合理性也一并抛弃了；我们在破除旧理性主义时，也要防止把正确的、有价值的理性也一股脑地扔掉了。这种“弃水泼婴”的幼稚病是昏昧的表现。旧理性过时了，非理性太时兴了，有的学者提出新理性的概念加以回应。这种新理性应当理解和阐释为实践理性。如果新理性只是停留在舆论、语言和幻想层面，会局限、缩小乃至损害它的意义和价值。只有通过实践实现了新理性，只有变成现实生活的物化形态的实践理性，才是新理性的理想境界。

缺乏震撼人心的力量。由于不同程度地脱离现实生活、人民群众和社会实践，因而西方现当代文论缺乏震撼人心的力量。书斋中的左翼人文知识分子本身并没有力量。知识要通过实践才能转化为力量。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与群众相结合的知识分子才是有力量的，不掌握权力和财富的知识分子是没有力量的。葛兰西关于“文化霸权”的理论，对推动建立文艺的领导权和话语权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拥有领导权和话语权的文学理论和文学作品才是有力量的。从整体上看，西方现当代文论和文学是缺乏力量的。尼采的“权力意志”和“超人哲学”从表面上看是有力量的。这种哲学亵渎上帝、冒犯权威、反叛传统。这种思想的表述方式如狂飙烈火，似有摧枯拉朽般的磅礴气势。尼采以批判家的雄伟，傲视一切。但由于全然拒斥理性，缺乏坚实的生活基础，尼采的哲学显得底气不足，似有虚脱和内疚之憾。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文化批判理论对遮蔽社会问题的“虚假意识形态”的批判，对表现出某些悲剧元素和负面作用的压抑人的“启蒙理



性”的批判，对导致人的异化，使人成为“单向度的人”的“工具理性”的批判，对包括大众文化在内的依附资本意志，为文化工业和商业社会所同化，一定程度上与主流意志同谋，蒙蔽、误导和改塑大众意识，实际上带有“反文化”性质的“文化批判”，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文化批判作为一个新兴的学科领域是不可或缺的。文化批判试图从文化层面介入政治，表现出一定的文化批判力量。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文化批判理论对疏导意识形态、工业理性以及文化生产如何按照符合人性的方向发展，具有深刻的思想启示。但这种文化批判理论也是有局限的。它只敏锐地看到了工具理性非人性的一面，如可能造成对人的欲望、个性、灵韵、浪漫情怀、自由意志和创造精神的压抑，但并没有论述工具理性肯定人，如提高人的智慧、技能和力量，健全自身、征服和善待自然、捍卫真理和维护正义的一面。存在主义比较关注“实践”的功能，表现出改变人的生态的意向，但忽视群体的力量，这种学说所张扬的孤独的悲观绝望的个体实际上是没有力量的。由于受到金钱拜物教、权力拜物教、商品拜物教的侵害和作践，人们一度都变得怯懦和孱弱了。反映到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作品中的人物形象都是缺乏力量的，如卡夫卡的著名小说《变形记》，描写人在压迫的重轭下变成了大甲虫那样的软体动物，有的作品表现处于异化状态下的人由于承受痛苦和灾难的折磨，心灵上受到重创而变得病态和畸形。这些荒诞的和处于异化状态下的“单面的”或“偏型的”弱势的小人物是值得怜悯和同情的，却是没有刚气和血性的。现代派的一些作家和理论家在国家机器、战争机器、工业机器和强大的物质力量的碾压下，他们的人生步履维艰，命运坎坷不幸。他们本身十分软弱——卡夫卡被他的研究者们称为“弱的天才”，绝不可能创造出震撼人心的理念和作品。我们有时只能在一些科幻影视作品中看到少许孔武有力的超常的巨人形象。即便是那些带有批判意向的理念和作品，对现实的批判也多半都停留在舆论、幻想、语言层面，或迷信道德说教、精神呼吁、审美救赎，甚至新感性革命、文化批判都带有不同程度的“坐而论道”或“纸上谈兵”的性质。一切精神批判都无法超越和取代实践批判，只能靠塑造“新人形象”，培育被马克思、恩格斯称为“有实践力量的人”，通过变革现状的物质批判去加以解决。因为只有“新人形象”才能从正面充分体现全新的价值体系和思想体系，才能作为“有实践力量的人”变革现实，改变旧环境，创造新世界。

以新人本主义为主旋律的西方现当代文艺理论和文艺思潮，都随意夸大主体，夸大心理、精神和意志的作用，包括海德格尔和萨特宣扬的“存在论”，都带有浓郁的主观成分。一些很有价值的思想，都这样那样地脱离客观世界，消解和遮蔽与现实生活的深层关联。对这些带有主观随意性的文学模式、理念、思想和学说理应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的解析，通过对话和改制，将其置放在坚实的客观世界的基础之上，赋予这些文艺理论和文艺思潮以可靠的现实性生活的根基，从而加强和提升这些文艺理论和文艺思潮的科学性。

对西方现当代文艺理论的良莠不齐和文艺思潮中的一些所谓“深刻的片面的真理”，应当进行辩证的解析。西方的文论史和思潮史上，一种文艺理念崛起后，不久便被另一种文艺理念取代，像走马灯那样，风水轮流转，各领风骚三五年。它们典型的特点是：一点论、片面性、绝对化、走极端、具有浓厚的“自恋情结”和强烈的排他性。同时交替地出现两种不可兼容、相互对立的观点。如客体性和主体性相互排斥，历史精神和人文精神彼此消解，有的宣扬“历史终结论”，有的则主张“人的终结论”。有人强调语言的可通约性，有人则认为语言具有不可通约性。物极必反，一种理念讲过头了，又要回过头来重新言说，以致不断出现学术研究的轮回现象和钟摆现象。我们注意到，一些西

方现当代文论家，特别是一些后现代主义者、新历史主义者、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者，由于新的历史条件和文化需要的驱动，又峰回路转，明显地表现出从他们所心仪的人文主体性学理向历史客体性学理回归的走向和趋势。

西方现当代文论，无论是现代主义还是后现代主义，无论是结构主义还是解构主义，都具有非理性主义的思想特征，不少消解社会理性、追求生理欲望、玩弄语言游戏、炫演“娱乐至死”的精神意向，都不同程度地陷入非理性主义的偏执。因此，运用理性的思维方式对各种非理性主义社会文化思潮进行鉴别和解析，在肯定非理性因素的合理性的同时，创造富有时代精神和实践精神的新理性是完全必要的。

我们应当运用宏观、辩证、综合、创新的思维方式，改制和整合西方现当代文艺理论和文艺思潮。为了实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全局性和总体性的理论创新，必须对西方现当代文艺理论和文艺思潮进行重组和整合。文学艺术和任何其他事物一样，实质上都是一个包括多层面各种复杂元素的有机集合体，因此必须对其进行跨学科的全景式、整体性探索和宏观的综合性研究。我们注意到，西方当代的一些明智的学者已经意识到迷信“深刻的片面的真理”的局限性，并开始努力改变这一状况。美国哲学家奎因力倡“整体主义”的学术研究。科学史家库恩主张打破学科壁垒，提出一种尽管带有非理性主义色彩的“范式理论”，却强调对学科进行“系统结构研究”的理念。伽达默尔的解释学，社会知识学的“强纲领”，特别是一些人类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艺术家的论述，都有意识地对文学进行各种形态的跨学科多层面的综合研究，表现出一些西方学者开始从局部的微观分析研究向全面性和总体性的宏观综合研究转型的发展势头。

文艺学既然是科学，便应当以科学的态度、科学的精神和科学的思维方式，通过平等的、有选择的学术对话，梳理和整合各种具有一定科学价值的思想理论资源。对待人类的一切思想文化遗产，既要有开放、包容、拿来的心态，同时又要有鉴别、批判、改造的精神；既要尊重和吸纳西方现当代文艺理论和文艺思潮中那些有益的学术成果，又要破除对西方现当代文论的盲目迷信和极端崇拜。在文化交流、交锋和交融中，我们应当本着“以我为主，为我所用，择善而从，采长补短，优化组合”的原则，经过批判继承，把西方现当代文论中那些先进的、有价值的东西，融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

我们应当拥有马克思那样的胸襟、智慧、胆识和勇气，像他对待黑格尔和费尔巴哈那样来批判继承西方现当代文艺理论、文艺思潮中那些具有先进性和合理性的学术成果和思想资源。马克思主义从来都是一个开放的思想体系，具有分析、鉴别、整合、改制、重塑人类的一切文化思想资源的卓越能力。我们应当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对待一切有科学价值的文化思想理论资源，重构、创造和发展当代形态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第二版序言

文艺思潮作为连接文艺创作和文艺理论的中介是最活跃的部分。文艺思潮包括文艺创作思潮、文艺批评思潮和各种文艺理论思潮。从思潮视阈研究文艺创作、文艺批评和文艺理论是一个重要的有效途径。

研究中国文艺和中国文艺理论的当代性，首先要研究中国文艺思潮的当代性。界定中国文艺和中国文艺思潮的当代性或现代性，首先要确认当代中国的国情定位。当代中国的社会历史结构是多元的，有前现代因素、现代因素，也有后现代因素。然而中国的国情定位，从总体上来说，不可能是前现代的，更不能说已经到了后现代，甚至还不能说已经实现了现代。我们只是开始摆脱了前现代的宗法制的自然经济，走向市场经济，并以全面实现小康社会作为全党全民奋斗的宏伟目标。然而，现代化的事业还没有完成，到达后现代和后工业社会还要走很长的路。因此，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看，我们国家的国情定位应当确认是从前现代向现代的过渡与生成阶段。当然，关涉历史的一切问题，都要放到其所属的一定的历史范围内加以考察，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界定文论的现代性或当代性，也应当将其放到所属的历史范围内和过程中来加以研究，以免产生曲解和误读。

当代中国影响比较大的文艺思潮有后现代主义、新历史主义和新人本主义等。

尽管当代中国的发达地区存在着甚至日甚一日地滋生着、蔓延着后现代主义的因素，但后现代主义只能部分地适合于当代中国的国情，中国广大地区，特别是广大农村地区还处于前现代的历史状态之中，当代中国只是正在从前现代走向现代，而且当代中国的现代性又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性存在着质的差异。西方发达国家的审美现代性与社会现代性是不相协调的，它们往往抵制和反对科技理性和启蒙理性。而当代中国的社会现代性，却最需要科技理性和启蒙理性，否则，必然会阻碍社会的进步，更不利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后现代主义有助于激活人们的思维方式，有利于消解那些我们应当消解的东西，但后现代主义不加区别地消解一切规律，明显违反“按规律办事”的原则，客观上影响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利于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

新历史主义从“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理念出发，夸大历史文本、书写文本以及阅读文本的所谓互文性，把历史变成可写和可读的文学文本，主观地把历史改写和重塑成一些研究主体所喜欢和能接受的样子。这种新历史主义具有明显的二重性，一方面可能帮助人们把被误读和误写的历史匡正和颠倒过来，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另一方面又可能表现出玩弄历史、消费历史、篡改历史的非历史化倾向。

新人本主义反对理性主义，主张非理性主义。非理性主义是新人本主义的基础、核心和灵魂。这种非理性主义的社会文化思潮对打破僵化、腐朽、压抑人的旧理性的精神枷锁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从非理性的领域释放和解放了人的思想、意志、情感和欲望，对人的个体化、主体化、内向化的潜意识研究取得了新的开掘和新的拓展，对全面地认识人的本质、意识结构和功能起到了填补空白的作用。应当允许并满足人们正常的、合理的欲望和生理需求，但一味地抵制人的正当理性，又可能导致人的本能和生理



层面的需求的泛滥，造成极端的个人欲望的膨胀，从而消解了大写的人的理想主义、英雄主义和为伟大事业献身的崇高精神，甚至诱使人们走向沉沦，陷入平庸化和鄙俗化。

中国当代文艺思潮有本土的因素，但大量地表现为受到域外，尤其是西方（特别是欧美）的社会文化思潮和文艺思潮的重要影响。我们应当阐明现当代西方文论思潮的魅力与局限，重视对现当代西方文论思潮本土化的文艺实践和审美经验的理论提升和学术总结，承接和汲取现当代西方文论本土化的成果，努力解决现当代西方文论本土化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概括出真正具有时代感和中国当代特色的文艺思想和文艺理念。

任何真理都既是普遍的，又是具体的。真理的普遍性寓于真理的具体性之中，又通过真理的具体性表现出来。任何学术活动的目标都是求真，从研究对象中探索和寻找规律。这必然要求研究主体具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精神意向，对社会实践和文艺实践中涌现出来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做出新的理论阐释。为了达到求真求新的目的，在现当代西方社会文化思潮、文论思潮、批评思潮和创作思潮本土化的过程中，应当特别强调“时”、“空”和“势”的概念。时间和空间是事物存在的方式，同时规定着事物所包含的真理的边界和适用范围。注重时间因素，一方面要追求与时俱进，推动文艺理论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另一方面也要考虑到不同历史进程中、社会条件下和文化语境里的不同国家、民族、人群和地域的文艺理论的历时性差异。注重空间因素，要适当强调不同地域和不同社会环境里的文艺理论的共时性差异，同时还要正视不同的文艺理论是“强势”还是“弱势”这种存在和发展状态上的差异。从世界范围看，尽管现当代西方文论是一种强势文论，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强势文论都必然具有可供选择的先进性和真理性，如已经进入后工业社会的西方现当代的后现代主义社会文化思潮实际上只能有限地适用于华夏大地上的某些发达地区，从整体上说，并非完全适合尚处于发展中的当代中国的国情、人情和文情。这种社会文化思潮与我国的历史发展状态和历史发展进程存在着明显的时代反差和历史错位。因此，不能原封不动地照搬和套用西方现当代的呈现出强势状态的文化 and 文论。任何异地和域外的文化和文论，都要经过有意识地鉴别和选择、创造性地融通和内化的深刻过程。

“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存在的都不一定是合理的”，这两个哲学命题都是正确的，应当完整地、辩证地对待这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凡是具有真理性的、有意义的、有价值的东西，都应当为我所用。我们要建立的是具有当代性、民族性和人类普同性的新文论。为此，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进行宏观辩证的综合与创新。马克思主义本身正是批判地继承人类一切先进文化思想的创造性结晶。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建设同样要承接和容纳 20 世纪以来文艺理论发展的最新成果，放开眼光，博采众长，走宏观、辩证、综合、创新之路。

根据我们的理解，古今中外大体上存在着三大文论话语体系和六大文论学理系统。这三大文论话语体系是：西方现当代文论话语体系和西方现当代文论话语体系的本土化，中国古代文论话语体系和中国古代文论话语体系的现代转换，马列文论话语体系和马列文论话语体系的中国化。我们应当把再创理论资源和倾听实践呼声有机地结合起来，重视对当代文艺实践和审美经验的学术概括和理论提升，重塑和建构出既具有世界性又具有时代感的当代形态和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的新体系。这六大文论学理系统是：研究“文”与“史”的关系，抽取出各式各样的历史主义文论学理系统；研究“文”与“人”的关系，总结出各式各样的人本主义文论学理系统；研究“文”与“自然”的关系，创建出各式各样的生态主义的文论学理系统；研究“文”与“美”的关系，概括出各式各样的审美主义文论学理系统；研究“文”与“文化”的关系，产生出各式各样的文化主

义文论学理系统；研究“文”和“文本”自身的关系，提炼出各式各样的文本主义文论学理系统。我们应当积极地、自觉地整合上述各种文论学理系统所包含着的合理因素，建构起涵盖“文”与“史”的关系、“文”与“人”的关系、“文”与“自然”的关系、“文”与“美”的关系、“文”与“文化”的关系、“文”与“文本”自身的关系以及与此相关的学科形态，诸如文艺社会学、艺术人学、文艺生态学、文艺文化学、文艺美学和文本学有机融合的宏大的文艺理论新体系。

这里，有两个学术热点问题，应当引起关注。一是要处理好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的关系，正确理解和阐释文化研究对文学研究的意义。对文学进行文化研究是必要的，但不必也不能用文化研究取代文学研究。虽然文学也是文化，但文学存在着自身相对的独立性。同时，至今对一些重大的文学理论问题的研究并没有穷尽，因此，“文学消亡论”是没有根据的。二是要研究科学文论和诗学文论的关系。作为两大学术思想体系，科学文论和诗学文论都有自身存在的理由和发展的空间。两者既是相克相激的，又是互融互动的。科学文论比较强调客观规律，诗学文论比较强调主观情感。用科学文论反对诗学文论，或用诗学文论抵制科学文论，用反映客观规律排斥表现主观情感，或用抒发主观情感贬抑揭示客观规律，都是不妥当的。正确理解和阐释文学中的“思”与“诗”的关系，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的关系，现实主义和表现主义、现代主义、浪漫主义的关系，仍然是文学研究中的一个十分繁难的、常谈常新的、重要的理论课题。

经济的全球化、政治的多极化和文化的多元化，必然带来文论的多元化。20 世纪的文艺理论，特别是西方的文艺理论取得了空前的繁荣和极度的发展，新潮激荡，流派纷呈，对艺术的本质、结构和功能的多视角、多层面的研究达到了相当精细的程度。各种文艺观念、批评模式都在各自所擅长的研究领域做出了新的开掘和新的拓展，对扩大学术研究的视野，挑选其中有意义、有价值的思想因素，吸纳和承接其中有真理性和合理性的思想成分，提供了极其丰富的理论资源，形成了当代中国多元和主导一体的文艺理论格局。这种文艺理论格局是健全的、合理的，是有利于文艺事业的繁荣和发展的。无主导的多元可能造成混乱无序，无多元的主导又可能导致单调刻板，只有主导与多元的共存并进，才能保证社会主义文艺事业既有主心骨，又充满着蓬勃的生气与新鲜的活力。没有一个统领全局的、占主导地位的、起主流作用的思想体系、文化结构和价值观念，是不利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只有建构起作为先进文化的组成部分，标示先进文化的前进目标和发展方向的创新和开放形态的文艺理论，才能体现历史发展的新需要，从而更加卓有成效地弘扬时代精神、民族精神、人文精神，更加强有力地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和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第一版序言

1997年，中国人民大学文艺思潮研究所接受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的委托，承担了一项关于当代文艺思潮和文艺创作倾向研究的课题。全面而系统地梳理、分析和评价中国当代文艺思潮的表现形态和基本特征，摸索和探寻出其中有规律性的东西，是非常必要的。经过三年的艰苦努力，这项课题终于得以完成，其成果就是这部《中国当代文艺思潮》。

本书力图从横向上把握思潮论，而不是着重从纵向上研究思潮史。当然，无史的论和无论的史实际上都是不可能的。任何一种学术著作，或倚重于史，或倾向于论，都在一定程度上这样那样地体现史与论的结合。本书的立意是强调思潮论，以思潮论带动和统摄思潮史。换言之，本书主要是研究思潮论，回顾思潮史、勾勒史迹、标举史实、援用史料都是为说明和阐释思潮论服务的。本书以新时期的思潮论为主，以新中国成立后的17年的思潮论为辅，这是从中国当代文艺思潮存在的基本事实出发的。新中国成立后17年的文艺思潮的表现形态比较单纯，除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之外，没有形成其他的可以称之为文艺思潮的样式和流派；而新时期改革开放的20年中，尽管现实主义仍然是中国当代文艺思潮的主潮，但由于西方社会文化和文艺思想的大量涌入，通过与中国文艺实践相结合，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当代文艺思潮的发展，中国当代文艺思潮从文艺观念、创作实践到批评模式都进入了纷纷攘攘、沸沸扬扬的阶段，呈现出千殊万类和流派纷呈的态势。因此，有理由、有根据将新时期的文艺思潮作为理论概括和学术提升的重点。

本书注重在理论上把握文艺思潮的系统性，努力从多角度尽可能完整地展示和深入剖析中国当代特别是新时期以来的文艺思潮，既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新历史主义等具体的文艺思潮历史形态研究，又有本体论、主体论、生产论、价值论、文化批评等理论与批评思潮的探讨，还有人本主义、形式主义、非理性主义、通俗文艺等思潮类型的辨析。对每种思潮的研究，本书都努力探明其文学观念或规范的来龙去脉，尽可能清晰地描述出其历史发展的流衍轨迹，并坚持以科学的态度在广阔的历史文化视野中客观地分析其功过得失。总之，本书通过从不同逻辑层面进行的梳理和评价，力图反映出中国当代特别是新时期以来文艺思潮的总体风貌。

文艺思潮的起伏更替无非是文艺观念和范型的变换，各种具体文艺思潮由于社会历史文化与文艺活动主体条件的不同而呈突变或渐变或二者交叉穿插发展的历史形态。新时期涌现的文艺思潮虽如乱花迷眼般复杂多变，但显示出一种创新求变的生气勃勃的时代气息，充溢着文艺自觉和冲破陈规陋习，摆脱落后于生活、落后于世界的窘境的热情，在最初突破狭隘的现实主义旧规范后，迅速进入一个移植、实验外来的文艺观念和规范的众声喧哗的时期。形形色色的思潮“各领风骚三五天”的局面，一方面意味着被压抑多年的能量得到了火山喷发般的释放，但饥不择食的匆忙，结果并不能实现与世界接轨的“大跃进”理想和期望，甚至招来新的焦虑和隐患；而另一方面，这种躁动的匆忙又是中国文艺发展的一个不可避免的成长阶段，正因为如此多样并放开手脚的实验和尝试，才有可能使文艺活动的主体在得失的比较中辨明方向，超越幼稚盲目，走向成熟，随着



形形色色思潮的隐退而出现的自觉或不自觉的回归现实主义文艺思潮的态势，就是一个鲜明的标志。现实主义再次显示出与国情相适应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而且由于其他种种思潮的冲击和比照而获得了多层面的丰富与拓展。自然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理论、批评与创作的实践，本体论、主体论、生产论、价值论、文化批评的观念探索，形式主义、人本主义、非理性主义、通俗文艺的类型思考，不仅深化了文艺的自觉，为现实主义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同时也开辟和保留了不同文艺思潮生成与发展的广阔空间，为文艺思潮的理论建设，为未来阶段与时代相适应的新的文艺思潮的生成积累了丰厚的思想和实践基础。中国当代特别是新时期的文艺思潮所具有的复杂性呼唤着科学的理性辨析。

在古今中外的关系问题上，新时期的文艺思潮所具有的复杂的双重性特别明显：承接既往的民族传统显得乏力，但吸纳西方的新潮非常突出。作为“舶来品”的文艺思潮在本土化的过程中，难免存在着“化本土”的倾向。中国式的审美主义、形式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都与中国当代的社会文化有诸多隔膜，存在一定程度的历史错位和现实反差。中国新时期的某些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作为西方现当代文艺思潮的操练、图解和演绎，确实存在着“水土不服”、“消化不良”和“食洋不化”的症结，这是必须引起注意的。但西方现当代文艺思潮作为一种特殊的思想理论，在与中国的文艺实践相结合，特别是在与中国新时期现实主义文艺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产生了良好的效果。中国新时期出现的带有现代性的各种思潮、流派的理论探索和实验，对充实、丰富和深化中国本土的文艺观念和批评模式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不了解西方现当代的文艺思潮，便不可能把握中国新时期的文艺现象的理论根源和发展契机。因此，本书着重从中国文艺思潮与西方现当代文艺思潮的联系中研究中国当代特别是中国新时期的文艺思潮。

本书力图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来阐述中国当代文艺思潮。文艺思潮不仅具有各种不同的性质，而且表现为各种不同的形态，如理论形态、创作形态和批评形态。理论形态的文艺思潮影响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创作形态和批评形态的文艺思潮又往往附丽着理论的色彩或可以升华为理论形态的文艺思潮。这三者之间是彼此联系和相互转换的。因此，本书尽可能地用理论和现象的事实说话，依托和注重创作实践，强化和优化文本分析，有意识地从文艺理论、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的有机结合上全面把握中国当代文艺思潮。

从总体和全局上说，任何一种文艺思潮都存在着正面与负面，所不同的是，各种文艺思潮的正面和负面的性质、结构、作用和功能的表现程度及表现形式均有这样那样的差异和倾斜，从西方移植过来的各种文艺思潮所包含的合理性和悖谬性往往错综复杂地纠缠在一起。因此，对任何一种文艺思潮都不宜采取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的简单化态度，单纯的正面分析和单纯的负面分析是不符合中国当代文艺思潮的实际情况的。对于犹如一种复调和声的中国当代文艺思潮，正确的做法是完整地研究其中的主导方面及其存在的复杂形态，运用辩证的观点和方法，进行深入的学理分析。

文艺思潮作为联系文艺创作、文艺批评和文艺理论的纽带，可以展现出将其一体化的文艺景观，而文艺思潮所包括的创作思潮、批评思潮、理论思潮和学术思潮又经常以鲜活的理论形态提供可资探寻的文艺诸多领域中富有规律性的东西。新时期的文艺理论往往是从能体现文艺创作总体倾向的文艺思潮所蕴含的学理中提炼和概括出来的。因此，加强文艺思潮研究，对繁荣文艺创作、优化文艺批评、深化和拓展文艺研究、建构富有时代感和民族特色的文艺理论，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实践意义和理论意义。

目 录

导 论	文艺思潮的基本概念	1
第一章	本体论文艺思潮	25
第一节	西方文艺学范畴的“文艺本体论”	26
第二节	当代中国文坛的“文艺本体论”话语	32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的“美学观点和史学观点”	36
第二章	主体论文艺思潮	43
第一节	文艺主体性的迷失与复苏	44
第二节	关于“文学主体性”的学术论争	48
第三节	文艺主体性的退化与深化	53
第三章	生产论文艺思潮	59
第一节	艺术生产理论的出场、理论渊源和流变	60
第二节	全面理解艺术生产理论	66
第四章	价值论文艺思潮	77
第一节	价值论文艺思潮的历史变迁	77
第二节	文艺丰富价值的全面展开	84
第五章	现实主义文艺思潮	89
第一节	现实主义文艺思潮的历史演变	90
第二节	新时期以来的现实主义思潮	93
第三节	现实主义的思想内涵和基本特征	100
第四节	中国当代现实主义文艺思潮评析	105
第六章	自然主义文艺思潮	109
第一节	自然主义文艺思潮的思想渊源	110
第二节	新时期文学思潮中的自然主义	114
第七章	现代主义文艺思潮	125
第一节	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的起因	125
第二节	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的主要表现	128
第三节	关于现代主义的论争	134
第八章	后现代主义文艺思潮	143
第一节	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特点、演变及命运	143
第二节	中国文学批评中的后现代主义话语	150
第三节	对中国后现代主义文本的分析	153
第九章	人本主义文艺思潮	161
第一节	中国当代人本主义文艺思潮的话语资源	162



第二节	中国当代文学与人本主义思潮	167
第三节	中国当代文学与“人文精神”思潮	174
第十章	英雄主义文艺思潮	181
第一节	历史观中的英雄主义	181
第二节	文艺作品中的英雄主义	186
第三节	“后新时期”英雄主义的显现方式	194
第十一章	女性主义文艺思潮	199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关于女性解放的理论	199
第二节	中国妇女解放道路与中国女性文学奠基	202
第三节	中国女性文学的发展道路	207
第十二章	新历史主义文艺思潮	217
第一节	新历史主义的历史诗学特征	217
第二节	新历史主义的方法论取向	219
第三节	新历史主义话语的审美形态	221
第四节	新历史主义的思想艺术特征	225
第五节	新历史主义文艺思潮的悖论性处境	230
第十三章	历史虚无主义文艺思潮	237
第一节	历史虚无主义的时代背景和哲学脉络	237
第二节	历史虚无主义的文化表征	241
第三节	历史的隐喻与现实的批判	256
第十四章	消费主义文艺思潮	259
第一节	消费主义文艺思潮的出场	260
第二节	消费主义文艺的主要文化模式	262
第三节	中国当下消费主义文艺凸显类型	267
第四节	消费主义的历史迷失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价值接受	271
第十五章	审美主义文艺思潮	275
第一节	中国当代审美主义文艺思潮产生的社会文化语境	275
第二节	当代中国审美主义文艺思潮	281
第三节	当代审美主义文艺思潮评析	286
第十六章	非理性主义文艺思潮	293
第一节	非理性主义文艺思潮的涌起和演变	293
第二节	文艺中的理性因素和非理性因素	296
第三节	非理性主义的文艺观念和文艺创作	297
第十七章	文化批评与泛文化主义文艺思潮	313
第一节	文化批评思潮	314
第二节	泛文化主义思潮	327
第十八章	通俗文艺思潮	343
第一节	通俗文艺思潮的流变	344
第二节	通俗文艺之辨	346

第三节	通俗文艺思潮的特征	349
第四节	通俗文艺思潮对当代中国文艺创作的影响	355
第五节	通俗文艺思潮的误区	357
第一版后记	362
第二版后记	363
第三版后记	365



文艺思潮的基本概念

导论

“文艺思潮”作为文艺学中常用的一个概念，正如“文艺学”这个概念一样，其中的“文艺”一词，在我国的学术习惯中，既可以专指文学，也可以泛指文学与艺术。因此，“文艺思潮”可以仅指“文学思潮”，也可以是“文学思潮”和“艺术思潮”的总称。在文学思潮与艺术思潮之间存在着种种复杂的关系和区别，但文学作为艺术之一种，而且，作为“思潮”，在原理上二者的确有着不可否认的一致性。尽管如此，由于本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文学思潮，只在某些局部涉及与文学思潮相关的艺术思潮，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误解，并确保理论的明确性和科学性，本节关于基本概念的讨论就定位于“文学思潮”。

文学思潮研究是以文学思潮为特定对象的文学研究，是文学研究的新发展、新阶段。其研究领域实际上也存在着理论的、批评的、历史的三个分野。文学思潮批评和文学思潮史是文学思潮研究的实践领域，离不开文学思潮理论为其提供方法论的指导原则。任何人在着手研究文学思潮之时，都不可避免地要碰到关于文学思潮的最起码的理论问题：什么是“文学思潮”？它的本性是什么？它有怎样的结构？如何把握它的特征？它和文学思想、创作方法、文学流派、文学运动、文学风格怎样区别？文学思潮与社会生活、社会意识、社会思潮有什么样的关系？对这些问题，研究者不能视而不见，必须有所回答。而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明确还是含糊，是接近对象本质还是南辕北辙，决定并制约着具体的文学思潮批评或文学思潮史研究整个过程中运用什么样的方法和视角，当然也支配着研究结论与科学形态的顺悖远近。在文学思潮的所有理论问题中，最根本的无疑是文学思潮的概念这一问题，如果对这个概念的内涵没有一个较为准确的界定，文学思潮研究是难以进行的。即使主张反本质主义的研究者可以把“什么是”的提问方式改变为